



目录

第一部分 哲学、宗教与文化名人演讲

启蒙反思与儒学创新

…………… 杜维明(世界著名儒学家,哈佛大学教授)/3

全球性威胁和全球伦理——十二点反思论纲

…………… 孔汉思(世界著名神学家,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31

人文精神与 21 世纪科技发展

…… 邱成桐(数学菲尔兹奖得主,世界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38

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

…………… 于尔根·哈贝马斯(国际著名学者,德国法兰克福
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44

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 松浦晃一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57

德语能否继续是科学的语言?

…………… 沃尔夫冈·弗律瓦尔德(人文科学学者,德国洪堡
基金会主席)/64



第二部分 政治名人演讲

中国在前进中所面临的挑战

…………… 罗伯特·鲁宾(美国前财政部长)/81

东亚金融危机的广泛影响

…………… 鲁宾斯·里库佩罗(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副秘书长)/87

世界贸易体系中崛起的巨龙

…………… 麦克·穆尔(新西兰前总理、WTO 前总干事)/94

开创日中携手共进的时代,构筑“一德一心”的日中关系

…………… 鸠山由纪夫(日本民主党前党首)/103

我们的朋友,新的伙伴

…………… 西蒙·克林(澳大利亚工党前领袖)/109

中国为何至关重要?

…………… 詹尼·麦克林(澳大利亚工党副主席)/115

东西方法律的沿革

…………… 费尔南多·德拉鲁阿(阿根廷前总统)/125

青年人是祖国的未来

…………… 古斯塔沃·诺沃亚·贝哈拉诺(厄瓜多尔前总统)/130

第三部分 外交使节演讲

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消费者日”

…………… 约瑟夫·普理赫(美国前驻华大使)/139

加强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至关重要

…………… 罗高寿(俄罗斯驻华大使)/145

创意英国:让生命发挥无穷创造力



..... 韩魁发(英国驻华大使)/150

中澳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 艾大伟(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156

21 世纪的澳大利亚

..... 唐茂思(澳大利亚驻华大使)/164

北约轰炸过后的南联盟

..... 斯洛博丹·翁科维奇(南联盟前驻华大使)/171

斯洛文尼亚与欧盟东扩

..... 鲁佩尔(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178

第四部分 经济学名人演讲

世纪之交的世界和中国经济

..... 罗伯特·蒙代尔(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89

一个经济学家的一生——兼论人民币汇率政策

..... 罗伯特·蒙代尔(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

从现代教科书看现代经济学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7

由两版《经济学》说开去

.....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18

发展战略问题

..... 尼古拉斯·H·斯特恩(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
高级副行长)/226

以自由看待发展

..... 阿马蒂亚·森(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40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强国战略

..... 詹姆斯·海克曼(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48

互联网的互联与定价



.....	让-雅克·拉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259
浅谈金融学教学	
.....	兹维·博迪(世界著名经济学家)/266
中国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前景展望	
.....	兹维·博迪(世界著名经济学家)/272
如何处理金融市场的中长期风险	
.....	罗伯特·J·希勒(世界著名经济学家)/280
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	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世界著名金融学家)/299
大学之灵—— 编后记	
.....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冯俊/315

第一部分 哲学、宗教与文化名人



演讲题目

启蒙反思与 儒学创新

杜维明

(Du Wei-ming)

演讲人简介

杜维明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世界著名学者、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杜维明教授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后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留学，196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世界许多高等院校讲授儒家哲学。1981年以来一直在哈佛大学任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杜维明教授1988年荣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多年来致力于第三代儒学、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以及现代精神反思等问题的发展的研究。

杜维明教授的著作主要有：《儒家思想新论》、《儒学第三期思想发展的前景问题》、《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心与普遍——儒家宗教性论集》、《儒家自我意识的反思》等。

2003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杜维明先生名誉教授称号，本文是他在名誉教授授予仪式后的学术演讲。

演讲时间：2003年10月22日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

主持人：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各位同仁，诸位同学，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和大家进行一些学术交流。这不能算是演讲，只能算我个人对于当前儒学创新与发展的一些还处在研究阶段的设想。

我原来提供的题目叫“启蒙反思与儒学创新”。启蒙，基本上就讲西方的启蒙，是从17世纪以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强势的思想潮流。启蒙的问题，既可以当做一个历史的现象，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理念，同时也可以当做一种心态。我今天讲的“启蒙反思”，是以启蒙的心态为主。

我在最近十几年一共进行了四个议题的研究。这些议题除了启蒙心态和儒学创新外，一个议题是关于“文化中国”的，有的朋友大概比较熟悉；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文明对话的。

简单地说，所谓文化中国，首先包括大陆、港台，也包括澳门和新加坡，这是第一个意义世界。此外还有海外华人，再加上国际人士，也就是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这些国际人士既包括学者，也包括外交、企业、媒体、宗教等不同专业中的人士，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中的人士，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问题有兴趣，也直接参与其中。我们知道，文化和习俗、个人族群意识有很大不同，它是要经过争取和奋斗才能得来的。既然如此，一个外国人可能对异己文化的理解在很多地方比本国人士作出的贡献更突出。比如说，对美国的种族问题研究最深的是瑞士的一位学者；对美国的民主问题研究最突出的是一位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科技史研究最深的是李约瑟。所以，在学术研究和文化研究方面并不是说：我生在这个土壤，我就一定有特别的优越之处——当然，在语言等方面，有特别的优越之处——有的时候，也正是因为生长在这个土壤中，才导致对有些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

文化中国的理念，也是和文明对话相关的。2001年，是联合国规定的“世界文明对话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来促进世界文明的对话。我也参加了这个小组，到世界一些地方去讨论。2001年的“9·11”事件前后，就在北京组织了一次文明对话。最



近在印度，也进行了一次关于文明对话的讨论。但有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我的同事亨廷顿，就提出了“文明的冲突”。但是我想，正因为有文明冲突的危险，文明对话才显得更为必要。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看，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8年提出的一个理念，现在让大家觉得更为重要。他认为，促使人类文明发展的几个大的潮流，可能在公元前6—1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些潮流到了20世纪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指出，南亚的锡克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中东的犹太教和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就属于这些潮流。他当时还突出强调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一位是苏格拉底，一位是孔子，一位是释迦牟尼，还有一位是耶稣。在今天来看，穆罕默德也应算是一位。在20世纪，这些轴心文明又重新出现，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我今天的基本设想，实际上非常简单，可以分几个步骤。主要是讲儒家的人文思想。我说的人文思想，包括道、学、政。道，就是它的基本理论。学，就是它的学术传统。政，就是它的社会或政治实践，或者制度上的实践。

儒家的人文思想，包括道、学、政，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由于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冲击，它节节败退，到最后基本上瓦解了。西方的文化，特别是以启蒙为主的西方文明，在这一百年来，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中形成了非常深厚的积淀。儒家传统文化，不管从经济上（主要是小农的经济），或者从社会方面（主要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还是从政治上（属于权威政治），在受了这套思想的冲击之后，基本上都被解构了。

儒家的人文精神如何重建，在这几十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强烈关注。这些问题，与中国的学者在文化界、知识界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有着复杂的关系。儒学能不能对以西方启蒙为代表的文明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是它能不能够现代化、能不能够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解构以后，儒家内部已经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这是儒家内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有许多学者并不接受这种意见，认为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存在着保守的、西化的和社会主义的这三种不同的思想潮流。而保守的，基本上维持了它的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愿意放弃它的核心价值。但是我认为，只要是敏感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五四”以后，西方文化都成为他们文化心理中的最主要的积淀。在西方文化的积淀中重新体认儒家的基本价值，就成为一个一般的现象。怎样使儒家这个发展了几千年的文明来适应强势的西方文明？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当然，西方文明所代表的不仅是船坚炮利，而且还有它的制度和基本的价值，它是全面的。所以儒家能不能对西方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意味着儒家能不能在被西方文明解体以后还继续不断地向西方文明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悖论。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在儒学发展与创新方面作出极大的贡献，而他一直想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使儒学能开出科学和民主之花。科学和民主，即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毫无疑问是西方文明的体现。除了科学和民主以外，后面还有自由和人权的理念。在“五四”开始的时候，自由和人权的理念比科学和民主的理念更突出。很多学者认为，科学和民主如果没有自由和人权的这些价值配合起来，它的真正的充分的发展，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有这样的情况：第一，儒学的人文精神被解体；第二，西方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了深层的积淀。而在这个积淀的前提下，儒学能不能作出创新性的回应，能不能自我改造？如果能够，面对现在人类所碰到的困境，儒家传统能不能作出一些贡献？如果要作出贡献，怎么样进行贡献？这些工作都是在一个文明对话与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们不能说儒家就是惟一能有所贡献的思潮。所以，我不能接受有些人的观点——认为 21 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或是中国的世纪，或者说是儒学的世纪——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21 世纪一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纪，这个多元文化中的强势文化大概还是西方的，它到底还要继续多长时间，这当然还是很难说的。

也正因为工作那么艰巨，碰到的情况那么复杂，所以，要进行儒学



创新，就必须要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即批判精神。所谓批判精神，特别是内部的批判精神，就是指从事儒学的学者应该从儒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对儒学有一个同情的理解，同时对它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各种不同的缺失和困境要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对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打倒孔家店，对家庭主义、等级主义、男权中心主义、权威政治的批判等等。这些批判精神，我认为，都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关注而且要继承的传统。如何再有内部的批判，如何一直体现儒家的批判精神，这是决定儒学能不能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 1982 年，新加坡准备发展儒学研究，当时我非常担心新加坡的儒学研究被政治化，所以，第一次让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作报告，我的报告题目就是“儒家的批判精神”。这个批判精神，就是面对现实的不合理进行批判。这是儒家的传统当中最值得珍惜的价值。如果这个批判精神不能得到发挥的话，那么儒家要想进一步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曾经提到，从事儒学研究应该有一种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经常是个人的，但是我希望这个自我意识不仅是个人的，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有群体性的。所谓有群体性的，即它不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没有经过反思的对传统的一厢情愿，而是真正要有批判性，即所谓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非常有趣，任何时候我只要提出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总有学者要提出质疑：你为什么总是要提群体的自我批判意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自我批判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们不愿意再做自我批判。我说：我这个不是自我批判，而是自我意识，但这是有批判性和群体性的自我意识。所以，我希望不要把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变成群体的自我批判意识，这中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从我刚才讲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两百年来，生命力最强势、最有影响力，可能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最有强势的精神，就是西方启蒙所代表的所谓现代精神。不管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



义，都是这个精神的体现。到了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也就是到了 20 世纪的后半期，这一精神的发展势头更大了，造成了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霸权，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它包括几个很重要的力量。第一个，在经济上讲，就是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不仅是哈耶克（F. A. Hayek）所提到的以个人自由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也包括哈佛很多对于社会公平特别敏感的学者所提出来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接受的人当然很多了。第二个，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多元多样：法国的民主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关系，所以革命精神特别强；英国的民主属于渐进的民主；德国的民主和它的民族精神有很密切的关系；美国的民主则市民社会非常蓬勃：这是不同的民主，但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它们又都一直在进行。第三个方面，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在社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影响中心或者压力集团，这些影响者和中央政府或政府结构基本上是分开的，这个力量或每一个压力集团都可以直接对政府进行质疑，或者能够形成压力。这两个力量如果能够存在的话，就会使市民社会比较蓬勃。再一个，就是所谓的个人尊严——有人称之为个人主义，但是我觉得个人主义这个提法有时候比较片面——就是对于个人尊严的尊重。这后面还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在支撑这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义。这些基本价值中最突出的价值，如果以美国社会为例，就是自由。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平等的观念、理性、法治、人权等。

这个潮流，也就是启蒙所代表的潮流，从西化，“五四”的时候所谈到的西化，到了 50 年代、60 年代大家谈的现代化，到今天我们来讨论全球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以后我们再分析，可能这中间还有些需要商量的——但是，无论是西化、现代化，还是全球化，都是从启蒙开始所引发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东亚，不是来自南亚，不是来自拉美，不是来自伊斯兰社会，也不是来自非洲，这是大家都必须接受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美国现在所走的单向主义，甚至是霸权，后面是根据它的自西方的启蒙开始所发展出来的力量。这中间，特别是从全球化的



立场来看，科学技术是最突出的，在经济方面，贸易和金融的发展很突出，这方面我相信没有什么可置疑的。从科学技术、经济的贸易、金融这方面的发展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一体化的过程——我们最近参加了WTO，很明显接受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一元化的潮流不可抗拒？也就是说，文化认同的问题怎样解决？这里牵涉一个不仅是文化认同而且是一个民族的根源性的问题。从族群、性别、年龄等各个方面来看，有一种强制的根源性，正因为如此，文明对话特别必要，因为经济和科技的一体化并不表示一种文明或一种语言或者一种文化价值可以宰制全球。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况下，我们才提出儒学创新的可能性。

有些学者认为英文可能成为世界惟一的语言，但即使如此——我想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英文本身也会分化的，所以在伊利诺伊大学有一个学报，这个学报就叫 *Englishes*，意思是有各种不同的英文：印度的英文、新加坡的英文、美国黑人的英文，还有其他各种变形的英文。可见，语言会慢慢产生分歧的。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大约有 6 000 种语言，可是语言的消失问题非常严峻，有的学者认为每一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100 年以后也许只剩下 600 种语言，以后还会慢慢再减少。但是我想，多样性是会维持的。

在这样情况下，儒家的传统里面有没有一些资源可以为人类文明提供参照？这和人类现在所碰到的困境大概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现在所碰到的困境，是西方的启蒙所代表的强势的精神，不管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属于社会主义，都是以前所没有碰到过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现在最严峻而且是长期的问题，就是生态环保问题。从 1969 年人类从卫星回视地球以来，人类越来越发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水的资源、土壤的资源、矿植物的资源，甚至空气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是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完全无法理解的。另外，还有贫穷的问题。关于现在我们讲的经济发展、全球化，以前有个观念是，全球化是水涨船高，富的越来越富，穷的未必越来越穷，大家分配不平均，但是那个饼做得越来越



大，大家所分配到的都会更多——这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也是美国的保守主义的经济理论所坚持的观点。但是这个情况现在并没有出现，现在全球还有 10 亿人为赤贫。贫穷的问题还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还有失业的问题。另外就是社会解体的问题，这个社会解体就是从家庭到社群，再往上推，甚至国家的观念，这些都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有些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的经济命脉。像世界经济论坛，每年有两千位与跨国公司有关系的企业家参加。这两千位企业家所掌握的资源大概比七八十个国家的资源的总和还要多。跨国公司力量直接对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在社会上运作的的能力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知道，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除了需要发展经济资本以外，也需要发展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通过对话、通过讨论辩论在社会上逐渐积聚起来的力量。这些力量无法量化，但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它对社会安定、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全部精力用在发展经济资本而不注重社会资本，它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就很可能是有问题的。除了科技能力以外，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也应该和科技能力配套。所谓文化能力，就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学、历史、哲学的一定的认识，我这里所谓认识并不仅仅是大学的精英的认识，而主要是小学生、中学生以及社会上一般人对这些文化资源的理解，这是一个社会的文化能力。如果一个民族只有科技能力，而文化能力在失落，对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历史的记忆、自己的文学各方面掉以轻心，那么这个民族能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声音，是很值得置疑的。另外，除了智商以外，还需要发展情商。

这样说来，从文化的角度，中国现在碰到两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如何了解宗教，对宗教的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处理。因为这是文化资源当中非常突出的一种资源，如果我们根据孔德以前的一种提法——它现在已经过时了——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通过迷信的宗教，



进入形而上的哲学，进入科学理性；我们在科学理性的时代既不必担忧形而上的问题，更不要讨论宗教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的，而且现在在西方世界，比如说美国吧，对宗教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宗教的问题在西欧、在北欧发展都是最突出的，在印度或在其他地方也都受到非常密切的关注。另外一个，是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问题。像中华民族，汉族大约有90%以上；少数民族大约有6%，但是有好几千万人。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对各种不同的少数民族应怎样进行调和？这种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生命力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挑战在西欧、在美洲、在其他地方，都同样存在。儒家的传统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自己认为，儒家的传统作为多元化文化背景下的许多资源当中的一种，固然不是一枝独秀的，但它有一些资源确是其他文明所不具有的。假如这个传统逐渐被消解，而没有使之创新，那么从人类共同的资源方面来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失，从中华民族的腾飞来看，当然是一个更大的缺失。

从孟子开始，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个叫人禽之辨，就是人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不同，就是何为人的问题。一个是夷夏之辨，这个夷夏之辨，就是文明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说，所有的夷都是不文明的，只有我们自己是有文明的，但是夷夏之辨当时所理解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文明。还有义利之辨，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发展，除了现实的利益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比如公正、公义。还有王霸之辨，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政治是属于一个和平发展的政治，还是一个霸权或霸道。这些问题在现在看来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没有必要再作讨论。

但是我认为，在现在的一些困境解决方面，包括生态环保、社会解体、贫穷等问题，儒家传统里面的宇宙论和人生观有它的特殊的价值。这些宇宙论和人生观在什么地方有特殊的价值呢？

从宇宙论的角度来看，儒家基本上主张人和自然应该有长久、持续的和谐。即使荀子讲“人定胜天”，他也基本上接受了资源有限的观点。



在启蒙开始的时候，像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的力量体现的最明确的方式就是了解、控制和征服自然。按照这种观点，人和自然是一种抗衡的关系，在培根那里，他甚至讲得非常突出：自然永远没有办法把它的裨利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对自然施暴，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它把内在的裨利交给我们。这是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

另外还有人和天的关系，也就是宗教的问题。儒家认为，人和天的关系，是一个相辅相成、天人合一的关系。

另外，儒家有入世的传统，它和现实世界有密切的关系，它的责任就在于转化现实世界。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我不能和鸟兽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是属于人的群体中的一部分。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观念，基督教讲未来的天国，佛教讲净土，道家讲离开凡俗世界到山林中修养；而儒家则是在这个凡俗世界里面并能够从内部来改变这个凡俗的世界，它有非常突出的价值。这个观念导引出来，也可以说有普世价值，它是可以和西方的自由、平等、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的尊严相配合的。一方面，个人属于关系网络中的中心点，从中心点来看，个人有他独立的尊严。另一方面，从关系网络来看，他有他的社会性。

有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是讲社会伦理的，对个人不尊重，至少不够尊重。我认为这是对儒家的一种误解。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如果不能为己，基本上是不能为人的，如果不建立自己的人格，不发展、不充分体现你自身的内部资源，你要想为社会服务，就有很大的困难，先要自己能站得起，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己之学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如果这个中心点不能掌握，即使你的关系网络很圆熟，你也只能是“乡愿”，不能够真正成为独立的人格。

在人生观的立场上，儒家有一个很简单的理念，那就是，个人与社群、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国际社群，一直到生命世界，最后扩展到宇宙，整个是配合起来的。所



以，我们讲公，公的意思就是能够往外推。一个纯粹自私自利的人，在儒家传统里面还是有价值的，至少比损人不利己要好，至少他自己能够独立。但是自私自利在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极小的要求，如果从个人再推展到自己最亲近、最接近的一批人，那么他的价值就比只是成全个人要高得多。单是成全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不顾别人，这不能说完全是非价值，但它的价值小，是个小人。小人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是人，是说他的局格比较小；君主是大人，他的局格比较大。但是，你不能否定小人也有自己的尊严。有的时候小人是讲一般的老百姓，这中间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从家庭来看，如果是姓杜的，这个家庭里面，我有一种亲切感，如果离开了姓杜的，是姓张啊、李啊、王啊，我没有亲切感。这里，亲切是价值，但是如果不能从亲切再扩展的话，它的价值是有限的，应该再扩展。一直到国家主义，比如说，爱国主义非常好，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从儒家来看是比较有缺失的。儒家思想不是地方主义，也不是国家主义，甚至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启蒙所代表的精神叫做人类中心主义，但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个人类和宇宙配合得比较宽广的视阈。如果从人生观和宇宙观来讲，这个视阈有它的价值，它慢慢地往前推，就是从私到公，个人是私，我的家庭是公；家庭是私，我的族群是公；族群是私，整个社会是公；社会是私，整个国家才是公；我的国家是私，国际社群才是公；国际社群所有的人类是私，面对植物、动物、整个生命世界，它才叫公，然后再推到宇宙。这个视野是非常宽广的，但是它的根源性非常强，它不是抽象的普遍，也不是局限的特殊，它是从特殊逐渐向外发散的普遍性。在开展普遍性的过程中，成全个人、家庭、社会等这些具体的结构，从它具体的结构展向一个宽广的视阈。

这一理念我们还可以在国际社群进行讨论。我直接参加了联合国——刚才提到了——2001年的文明对话的小组，在这中间我们谈到了普世价值。以前，有一位西方的神学家，他的中文名字叫孔汉斯，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认为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应该作为人类普世价值的



前提。

第一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叫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犹太教的一个基本信念。这个观念和“己所欲施于人”是有冲突的，“己所欲施于人”是基督教讲的。孔汉斯是一位很重要的天主教神学家，他认为基督教的原则在最低限度的人类和平共存方面有侵略性。按照基督教的这种观点，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我希望你接受，我知道我有福音，我希望我把福音传给你，这和说我不愿意人家加诸我，我也不加诸人，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要向外面传教，到伊斯兰的世界里传教，到非洲传教，这中间是会发生冲突的，如果伊斯兰教也坚持这个原则，它也到基督社会来传教，这中间又有冲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和平共存来讲，在最低限度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是消极原则。这个消极原则是有问题的，所以要有积极原则来支撑它。这个积极原则就是刚刚提到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首先我要建立我自己，而因为我要建立我自己，所以我又要建立其他人，其他人包括我的最亲近的人，也包括逐渐往外推及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没有作为孤立绝缘的个人，在儒家传统中，不接受个人作为一个孤岛的观点，而认为个人是变化的、发展的，像流水一样，水如果要向前流，它就要有它的根源性，流水一定要跟其他的水相交融，这和一个孤立绝缘的孤岛是有很大不同的。

在美国的学术界，过去 20 年来，一批最杰出的学者就在讨论如何超越美国的个人主义。美国所代表的那种强势的、带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是社会解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何来对付这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儒家在基本原则方面有它的特殊价值，另外还需要配合前面所提到的西方的基本价值，重视自由。在美国社会，自由的价值特别突出，我们情愿放弃平等和公义，我们要发展自由。但从儒家传统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注重自由的发展，而不注重公义价值，只是发展自由，而不注重平等，这是有问题的。理性非常重要，但是，在人与人相处时理性以外的同情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当然了，理性和同情并不是矛盾冲突